

關於所謂米粒瓷

■ 謝明良

本文是想談談在坯胎透雕紋樣之後通體施釉，故而在光照下鏤空無胎、只以釉填平紋樣透亮的這類俗稱「米粒瓷」的陶瓷器。從清宮造辦處檔的記事看來，景德鎮官窯所燒造的在器坯鏤空處施釉糊平的裝飾，有可能稱做「漏花」。長久以來，西方陶瓷史著作咸認為中國漏花飾陶瓷，是受到西亞陶藝的啟發而出現於十八世紀。本文則是省思中國考古遺址出土的疑似同類標本，試著予以定位，想像中國漏花技藝或可上溯隋至初唐時期。

中文「米粒瓷」，是二十世紀後期譯自英文 rice grain porcelain 的新名詞，後者是借用了法語 grains-de-riz 的語意，指的是在坯胎透雕紋樣後通體施釉，光照下鏤空無胎只以釉填平之紋樣透亮的陶瓷器（圖 1），日本人稱它為「螢手」，中國學者則主張這類陶瓷即清代文獻頻見的玲瓏瓷。

玲瓏瓷和米粒瓷

傅振倫譯注乾隆年間（1736-1795）朱琰《陶說》提到的「寶相玲瓏」時，特別附注說明此是屬「鏤花之玲瓏瓷，兩面透洞，以釉糊之，透花處透明」，將其和鏤空處無釉的全鏤空予以區隔。1980 年代汪慶正主編的《簡明陶瓷詞典》「玲瓏」條，則將玲瓏瓷區分為



圖 1 嘉慶 3 年（1798） a. 青花白瓷漏花碗 b. 底部 高 6.4 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 Garner, Sir Harry.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pl. 82A.



圖2 錦上添花玲瓏轉旋冠架 「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通高3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7915



圖3 松綠抹金玲瓏香筒 「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通高70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馮先銘、耿寶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336，圖70。

兩類，其一是透雕鏤空，鏤空紋樣無釉，另一是坯體整體施釉，洞眼得以墁平，光照下如花紋呈米粒狀拼綴而成，將所謂米粒瓷納入玲瓏瓷中的一種類型。

相對而言，清末寂園叟著《匋雅》載「鏤花則兩面洞透，所謂玲瓏瓷者也」（卷下），認為玲瓏瓷即鏤花，未涉及鏤花空洞處是否施釉。不過清宮造辦處檔案倒是可以見到不少玲瓏瓷相關記載，有的甚至可與現存實物進行比定，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帶「大清乾隆年製」青花款的洋彩鏤空轉旋冠架（圖2），可能即乾隆九年

（1744）由督陶官唐英（1682-1756）所進上的「錦上添花玲瓏轉旋冠架」；現藏北京故宮的松綠抹金鏤空香筒（圖3），或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海福進貢的「松綠抹金玲瓏香筒」，鏤空冠架既可內置香料，透洞的香筒也可散發內貯柱香的香氣，設計堪稱巧妙。總之，從以上清宮玲瓏瓷透雕處均不填釉，可知清人習稱的玲瓏瓷並非空透處也施釉的所謂米粒瓷。

稱陶瓷鏤空裝飾為玲瓏一事，也見於明人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書》記載景德鎮官窯的各種裝飾：「或描花、或堆花、或暗花、或



圖4 萬曆（1573-1620）青花五彩龍紋山水筆架 高9.7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圖5 康熙（1662-1722）盃口玉壺春式水煙瓶 高23公分 英國私人藏 取自 Welsh, Jorge ed. *Linglong*. Lisboa: Jorge Welsh Oriental Porcelain and Works of Art. 2004, 47, pl. 5.

錐花、或玲瓏」，其中嘉靖二十年（1541）所燒造官窯器有「青花白地海水頂粧玲瓏三龍山水，五彩玲瓏山水筆架五百」（卷七）的記載。從美國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萬曆窯青花三龍山水鏤空筆架，或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藏萬曆青花五彩同式筆架（圖4），其鏤空處均無釉，可知明代後期文獻所謂玲瓏瓷也是鏤空處透通無釉的器類。著名的法國傳教士殷弘緒（d'Entrecolles, 1644-1741）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予耶穌會奧日神父書簡中提到他在景德鎮目睹了一種前所未見的瓷器，其整體鏤空通透，中央置可裝盛利口酒（liqueur）的盃蓋，杯子和鏤空完全連成一體，¹而這樣的造型構思，很容易讓人連想到康熙年間（1662-1722）輸往波斯的青花盃口玲瓏玉壺春式水煙瓶（圖5）。Christiaan J. A. Jörg 另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1643-1646）所載 half doorluchtige 或 doorluchtige 之意謂半透明的中國外銷瓷碗，指的可能就是鏤空玲瓏瓷（圖6）。²

清初官窯米粒瓷和漏花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陶瓷中也包括在器坯鏤空紋樣，並在鏤空處填釉燒成的所謂米粒瓷，所見器形有無款白瓷觀音瓶（圖7）和外底帶「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篆款的白瓷碗（圖8、9），從瓶和碗鏤空紋樣作風極為相近，可以推測無款觀音瓶當是乾隆朝製品。另外，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另收藏一件同為乾隆朝之同類型的白



圖6 17世紀 青花白瓷鏤空碗 高6公分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藏 取自 Jörg, Christiaan J. A.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82, pl. 71.



圖7 18世紀 白瓷漏花瓶 高22.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6544 參自陳玉秀、林容伊主編，《花事·閒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152-154，圖II-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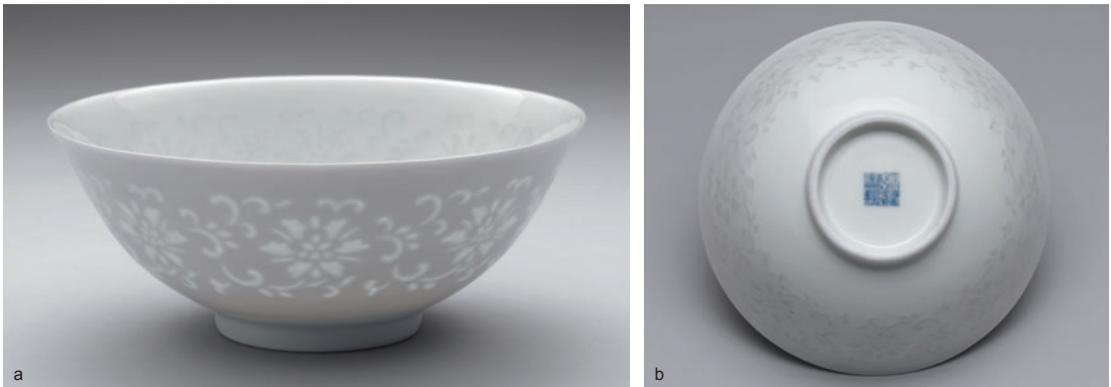


圖8 乾隆 a. 白瓷漏花碗 b. 底部 高5.3，口徑13.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7572



圖9 乾隆 a. 白瓷漏花碗 b. 底部 高5.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6380

瓷龍紋盤，底書「敬畏堂製」青花款（圖 10）。由於雍正（1723-1735）以來清宮造辦處檔案可見不少與官窯器形、花紋有關的記事，因此檢索清宮造辦處檔案，應該是必要的基礎作業。

鐵源等《清代官窯瓷器史》附表列記乾隆朝官窯碗之百餘種釉彩器形和紋飾當中有「白磁漏花」一式，³但無說明。檢索清宮造辦處電子檔，的確可以搜尋得到「填白磁漏花碗」記事（乾隆五十九年），但屬孤例，因此儘管個人極感好奇卻也不得其解。說來慚愧，近日再次翻檢架上《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赫然發現早在二十多年前余佩瑾已經援引乾隆五十九年（1794）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所見「填白瓷鏤花碗」，將故宮藏此類碗（同圖 8）定名為「剔透番蓮碗」，並在她迄今尚未正式出版的博論中提示乾隆五十四、五十五年亦有相關記事。⁴雖然只是表列檔案年次，沒有文字說明，但均已提示線索，故本文擬就造辦處檔相關記事談談個人的理解並試做解說，同時確認米粒瓷和漏花瓷的可能關連。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一月初七日，員外郎大達塞等來說「太監鄂魯里交填白漏花碗一件。乾清宮。傳旨：發往九江關，照碗樣欸，大小變別花紋，燒造十件送來，欽此」。翌年，即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二十日，將五十九年奉旨燒造自九江關送到的「填白磁碗十件，隨原樣一件呈進。碗十件交寧壽宮，原樣交乾清宮訖」。在此有幾點想提請讀者留意：1. 做為模倣對象的樣碗是乾清宮度藏品。2. 交由九江關照樣倣製的樣碗需送回乾清宮收貯。3. 五十九年度稱該樣碗為「填白磁漏花碗」，翌年則稱該樣碗為「填白磁碗」。4. 依照樣碗燒成的十件填白磁碗是交由寧壽宮保管。

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十二日，員



圖 10 乾隆 白瓷漏花龍紋盤 「敬畏堂製」青花銘 口徑 16.2 公分
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 取自 Li, He. *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276, pl. 530.

外郎大達色等來說「太監鄂魯里交填白磁暗花撇口碗一件現乾清宮收。傳旨：發往九江關，照樣燒造十件送來。欽此」。一年之後，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二十四日，員外郎大達色等，將去年度奉旨燒造由九江關送到的「填白磁暗花撇口碗十件隨做樣碗一件呈覽。奉旨：交寧壽宮養性殿收貯，做樣碗仍交乾清宮。欽此」。這裡也有幾點需留意之處：1. 樣碗是乾清宮提交的，此與五十九年情事一致。2. 任務完成後樣碗需送回交乾清宮保存，這也和六十年度情事相同。3. 乾隆五十四年稱送交九江關的樣碗是「填白磁暗花撇口碗」。4. 依照樣碗新燒的十件填白磁暗花撇口碗，是交由寧壽宮收貯，此與六十年情事相同。5. 從發交到燒成呈進，十件填白磁碗需花費一年的時間。

依據以上的說明和比對，可知無論是發交、呈進人員名錄、樣碗或新燒碗的存放地點，燒造件數和所需時日，都表明分別於五十四年、五十九年發交的樣碗，以及五十五年、六十年呈進的新燒碗是同類型的白磁碗。因此，「填白磁漏花碗」（五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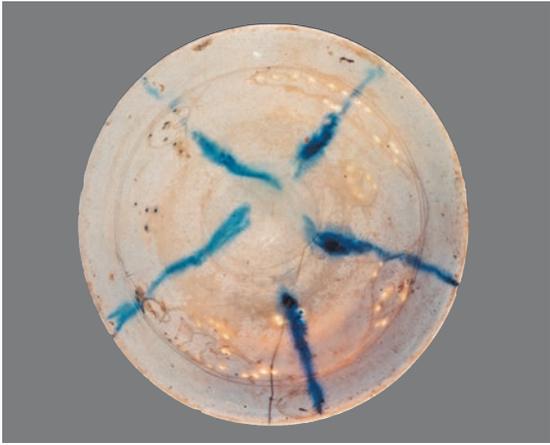


圖 11 12 至 13 世紀前期 波斯漏花藍彩白釉碗 高 6.8 公分 英國私人藏 取自 Watson, Oliver.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6, 321, Cat. L.21.



圖 12 13 世紀 波斯 (Kashan) 漏花翠藍釉碗 高 9.7 公分 英國私人藏 取自 Watson, Oliver. *Ceramics of Iran*. 310, pl.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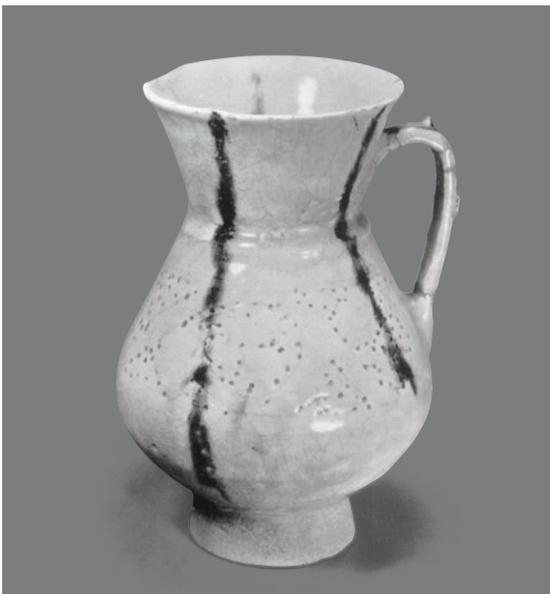


圖 13 12 世紀後期至 13 世紀前期 波斯 (Rayy 或東伊朗) 白釉漏花藍彩把壺 高 20.4 公分 日本私人藏 取自三上次男, 《續図録ペルシアの陶器》, 東京: 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1964, 圖 125。

年度和筆錄人的不同，也作「填白磁暗花撇口碗」（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或「填白磁碗」（六十年十月二十日）。換言之，清宮檔案是將於鏤空處填釉之譯自西語的米粒飾稱為漏花，有時也將之歸入暗花類。如果以上推測可行，那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今名「白瓷雕花玲瓏紋瓶」的無款漏花瓶（同圖 7），或即清檔所見「填白釉」觀音瓶？另據故宮器物處王亮鈞研究員的教示，該瓶原藏清永壽宮，而故宮所見計 20 件的白瓷漏花碗則是乾清宮端凝殿藏品。

中國漏花瓷和波斯透雕炆器

波斯炆器 (stonepaste ware) 也稱熔塊炆器、熔塊陶 (frit ware) 或複合胎炆器 (composite paste ware)，指的是以研細的白石英摻合玻璃粉末和白粘土，拉坯成形後施罩鹼性透明或各色釉在攝氏 800 ~ 900 度間燒成的熔塊陶瓷。這類複合胎熔塊炆器經常可見和前述所謂米粒瓷有著相同的裝飾意趣，是在器坯穿孔並以釉糊實，燒成後呈現透映效果的透雕飾 (pierced decoration) (圖 11 ~ 14)，屬漏花陶瓷。

早在二十世紀初，霍普森 (R. L. Hobson) 已曾撰文指出陶瓷漏花技法源自中近東，出現於十一世紀的埃及，再傳至敘利亞和波斯，文



圖 14 13 至 14 世紀 波斯白釉漏花碗 高 6.3 公分 日本私人藏 取自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編, 《ペルシアのやきもの: 8000 年の美と伝統》, 愛知: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 2007, 頁 67, 圖 124。

中既援引西元 1042 年納西爾·勞倫斯 (Nasir Khusrau) 在舊開羅市集，見到執拿時可以映透外壁手指的半透明薄胎陶瓷，也提示了一件埃及福斯塔特 (Fustat) 採集到的漏花白釉標本 (圖 15)，同氏認為既然中國漏花瓷的年代初見於乾隆朝或稍早的雍正朝，所以中國此一裝飾技法應是受到十八世紀自波斯灣貢布隆 (Gombroon) 港出口輸往歐洲被稱為貢布隆陶瓷 (Gombroon ware) 之伊朗漏花製品的影響 (圖 16)。⁵ 之後的陶瓷史著作，大多是在霍普森說法上所做的微調和資料增補。如 H. Garner 就認為此類漏花陶瓷最早見於波斯，中國晚迄乾隆時期才出現；⁶ 1970 年代 E. Harstone 也曾提示幾件帶所謂雍正年款的景德鎮漏花瓷，並主張中國此類製品直到十八世紀前半之後才出現。⁷ 近年 Oliver Watson 亦主張中國漏花瓷始見於十八世紀，而中東地區則是在十一世紀初現於敘利亞、埃及移住陶工生產的塔爾米尼陶 (Tell Minis)，十二至十三世紀製品有許多來自伊朗東部和中部卡山 (Kashan) 或裏海南方的雷伊 (Rayy)。⁸ 另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收的同類製品據說來自裏海東南部的古爾幹 (Gorgan) ；



圖 15 埃及 Fustat 出土漏花標本 取自 Hobson, R. L. "Notes on an Early 'Persian' Bowl and 'Rice-Grain'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1, no. 50 (1907): 85, pl. 4.

Charles K. Wilkinson 也曾在呼羅珊地區著名的尼什普爾遺址 (Nishapur) 發掘得到十一世紀後半期的伊朗製漏花標本。至於貢布隆陶瓷和中國漏花碗之間影響關係的評估，學界迄今仍然是停留在兩造標本年代孰先孰後所導引出的直截判斷，未見具體的比較討論，甚至僅只以兩者關係難予斷定而一語帶過。

相對於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區域在陶瓷坯體透雕鏤空處施釉糊平之漏花技藝的年代不能早於十八世紀，自 1980 年代起，中國的考古資料卻也陸續提示了若干與此一議題相關的有趣標本，其中又以江西省豐城唐代洪州窯窯址及周邊地區出土標本的年代最早。如 1981 年陳柏泉已為文指出江西豐城洪州窯窯址標本當中，包括有釉色淡清微閃黃的細胎瓷，器形多為蓋杯類，其器腹上壁或下壁環鏤透雕，是唐代燒造玲瓏瓷 (此指漏花瓷) 的實例。⁹ 三上次男幾乎在同時獲知此一訊息，並曾於日本東洋陶磁學會所主辦的中國陶瓷史座談會上與眾人分享，由於當時他未親見實物，所以未置可否，沒有進一步的發言。1983 年刊《中國的瓷器》則引用王志敏見聞，於附註中提及「玲瓏瓷」 (此指漏花瓷) 早見於隋代青瓷，隔年余家棟也明確



圖 16 17 至 18 世紀 白釉漏花碗 高 6.5 公分 英國私人藏 取自 Watson, Oliver. *Ceramics of Iran*. 394, pl.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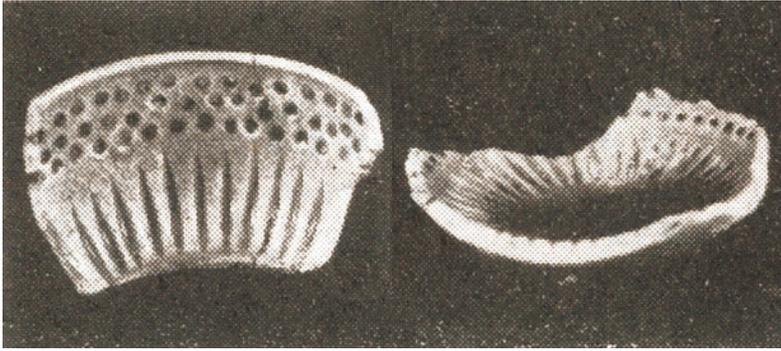


圖 17 隋代至初唐 青瓷漏花瓷片 江西省豐城市羅湖窯窯址出土 取自江西省歷史博物館等（余家棟等），〈江西豐城羅湖窯發掘簡報〉，收入《中國古代窯址發掘調查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90，圖 15 之 14、15。羅勁松主編，《洪州青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頁 28，圖 59 之 1。



圖 18 洪州窯青瓷漏花碗 口徑 9.7 公分 洪州窯窯址出土 取自萬德強，〈洪州窯出土的兩件精美瓷品〉，收入《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 5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頁 59，圖 1。

指出洪州羅湖窯兩件透雕處糊釉透光標本（甲 T4 出土）（圖 17）的年代可上溯隋唐時期。¹⁰然而，除了任職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的華人研究員在為該館藏乾隆時期漏花瓷盤（同圖 10）撰寫說明時，曾涉及洪州窯漏花瓷例，¹¹截至目前似乎未見中國以外學者有關洪州窯漏花瓷標本的正式評論。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到底是因外國學者疏忽中國考古資料所致？抑或根本就不認同洪州窯址標本乃漏花瓷例？總之，確認洪州窯標本的屬性，是本文首先必需解決的課題。

就中國陶瓷裝飾史而言，鏤空和人工施釉都有著悠久的傳統。前者鏤空飾在新石器時代龍山黑陶已經常見，而人工施釉也可在西元十八至前十六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由南方燒造北運而來的灰釉炆器得以實證。筆者感到好奇的是，洪州窯窯址標本是否就是陶工有意識地將以上兩種裝飾技藝進行結合的案例？換言之，鏤空處是刻意填充瓷釉糊平的人工做為，或者只是在燒造過程中部分瓷釉自然流淌填入鏤空飾坯體所導致？就經正式報導的考古發掘資料而言，江西曲江羅湖村寺前山窯出土內壁飾直條紋的碗，其口沿鏤空裝



圖 19 隋至初唐 洪州窯青瓷漏花鉢 中國私人藏 取自青龍山人，〈大隋·隋代文化藝術月〉，《微信公眾號得一堂藝術空間》。

飾帶均填充青瓷釉（同圖 17），由於類似的漏花瓷鉢於羅湖村象山洪州窯窯址亦曾出土，可知並非孤例。其次，江西豐城市博物館也曾在羅湖地區的隋代窯址遺跡採集到一件鏤空紋樣填釉的帶足豆形盤青瓷（圖 18），引人矚目的是，中國私人藏品甚至可見口沿無釉採對口燒之口沿上方飾鏤孔裝飾帶，內壁身腹和底分別押印波紋和朵花，由朵花所圍繞的底心飾重圈紋的洪州窯青瓷鉢（圖 19）。後者從圖片看來，



圖 20 隋代 青瓷鏤空五管瓶 江西省南昌縣博物館藏 取自賴振敬，〈洪州窯青瓷研究〉，《四川文物》，2019 年 6 期，頁 74，圖 10。



圖 21 唐代 青瓷把杯 高 5.2 公分 羅湖寺前山窯址出土 取自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豐城市博物館編著，《豐城洪州窯址》，圖版 44 之 5。

鏤孔處似多填釉，器形和裝飾構思近於前引洪州窯羅湖窯址出土標本（同圖 17）。另外，南昌縣博物館藏洪州窯青瓷五管壺，壺肩五只與中央壺口齊平的鏤空長圓管，管身飾豎眼形鏤空，管口以下方眼形鏤空為間隔，飾成雙的倒三角形鏤空，繞飾管口的三角形鏤空明顯可見均勻完整的瓷釉，看來似屬於漏花器類（圖 20）。

洪州窯瓷的西方要素

經由以上的觀察，我個人是支持洪州窯此類鏤空標本乃漏花瓷的觀點。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這類或是以人工方式填釉糊平的漏花瓷殘件，於該窯出土標本中所佔比例極為稀少，比如說由北京大學和江西文博單位聯合組成針對洪州窯址費時二年（1992-1994）的發掘，並未發現任何漏花瓷標本；¹² 而經常出現在由當地文博人員執筆報導的兩件漏花標本（同圖 17），其實也是自 1980 年代余家棟報告披露以來，一再出現的老案例。不僅如此，因目驗而確認標本工序技藝的直截判定，當然也可能因人而異，也就是說縱

使是針對同一標本的觀察也可得出不同的結論。考慮及此，本文所將採取的策略是，將重點置於可能成就此一在鏤空處填釉糊平的窯業文化氛圍，以便檢驗或說鞏固筆者自身判斷的正當性。

首先應予留意的是，洪州窯隋唐時期標本當中可見不少似乎是以西方金屬器為祖型的外來器式，此如象山窯區或羅湖寺前山窯區出土的帶上揚墊指板的環狀把大口盃（圖 21）或報告書所謂三足爐（B 型）（圖 22）。後者除足部之外，器身和瑞典藏西伯利亞出土的高錫即響銅杯造型相近（圖 23）；前引口沿部位圍飾鏤空帶，內壁飾直線紋的盃（同圖 17、19），也容易讓人連想到薩珊波斯的放射線式水波紋銀器。至於洪州窯陶瓷頻見的在器外壁或內底戳印各式朵花等裝飾也頗有西方金屬器的裝飾意趣。本文不擬在此逐一鋪陳比較，但想例舉一式在器形和飾紋方面均和外來工藝製品相近的案例，以便說明洪州窯瓷中的西方意趣。如羅湖寺前山窯區出土報告書列入（C 型Ⅲ式）的餅足杯（圖 24），其造型既和寧夏天周天和



圖 22 唐代 青瓷三足爐 羅湖寺前山窯址出土 取自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豐城市博物館編著，《豐城洪州窯址》，彩版 15 之 6。



圖 23 響銅杯 瑞典國家歷史博物館 (Statens Historiska Museer) 藏 取自 Melikian-Chirvani, Assadullah Souren. "The White Bronzes of Early Islamic Iran."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9 (1974): 145, fig. 37.

四年 (569) 李賢夫婦合葬墓出土的薩珊朝波斯玻璃碗相近 (圖 25)，類似的重圈紋玻璃碗亦見於日本京都市上賀茂神社境內出土標本，後者之雙重圈飾也和洪州窯杯身的雙重圈印紋相近 (同圖 24)。其次，洪州窯該青瓷杯口沿處飾弦紋數周，杯體以戳印手法押印雙重圈紋，類似的帶中心點的雙重圈紋飾亦見於江西九江唐

墓¹³ 或隋至初唐期的北方鉛釉陶杯 (圖 26)，Melikian Chirvani 亦曾依據中國釉陶杯的雙重圈紋與伊朗響銅器飾紋相近 (圖 27)，認為前者乃是受到後者影響之下的產物。但也有以朝鮮半島松林寺磚塔出土或日本正倉院藏之於器身熔接散飾的單圈紋玻璃杯為例，認為此類紋樣或來自同時期的玻璃器。¹⁴



圖 24 隋代 青瓷杯 羅湖寺前山窯址出土 取自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豐城市博物館編著，《豐城洪州窯址》，彩版 14 之 5。



圖 25 北周天和 4 年 (569) 玻璃碗 高 8 公分 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南郊鄉深溝村李賢夫婦合葬墓出土 寧夏固原博物館藏 取自寧夏固原博物館編著，《固原歷史文物》，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127，圖 78。



圖 26 隋代至初唐 綠釉杯 高 7.1 公分 河北省威縣侯貴鎮後郭園村墓出土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邢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 174，圖 179。



圖 27 響銅鉢 口徑 17.6 ~ 17.7 公分 伊朗呼羅珊地區 取自 Melikian-Chirvani, Assadullah Souren. "The White Bronzes of Early Islamic Iran." 142, fig.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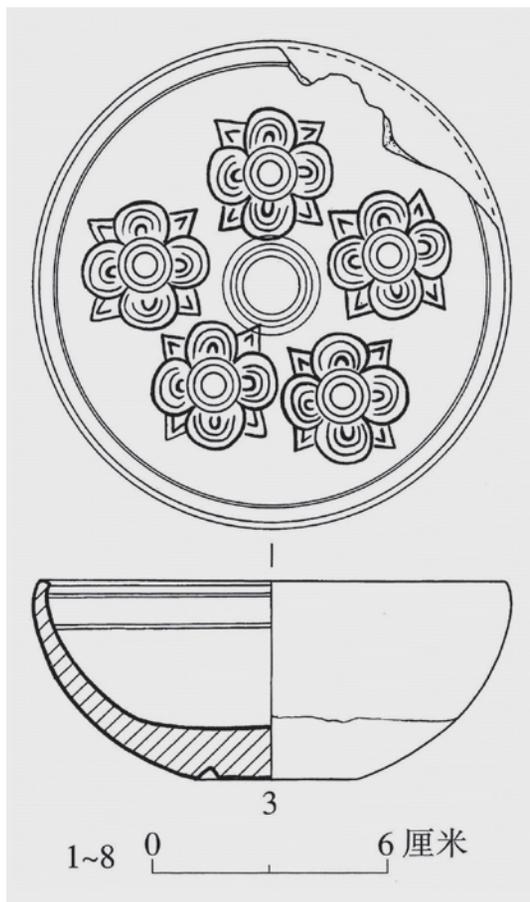


圖 28 隋代青瓷鉢線繪圖 羅湖寺前山窯址出土 取自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豐城市博物館編著，《豐城洪州窯址》，頁 136，圖 86 之 3。

由於西方金屬器和玻璃器在器形和紋飾等方面往往互有影響，呈現出共通的時代樣式，因此從中國陶瓷出發欲尋覓其確切的祖型並非易事。不過，就前引洪州窯杯而言（同圖 24），雙圈飾紋上方近口沿部位所見數道弦紋，似乎透露出其祖型是來自可能是以轆轤修整的響銅器。就此而言，Melikian Chirvani 文中所援引的在口沿下方和器肩部位飾兩道弦紋，其間夾飾帶中心點圈紋帶的伊朗製響銅平底鉢（同圖 27），其圈紋帶飾既和前引口沿鏤空填釉的漏花瓷碗（同圖 17、19）的裝飾布局相近，其器形和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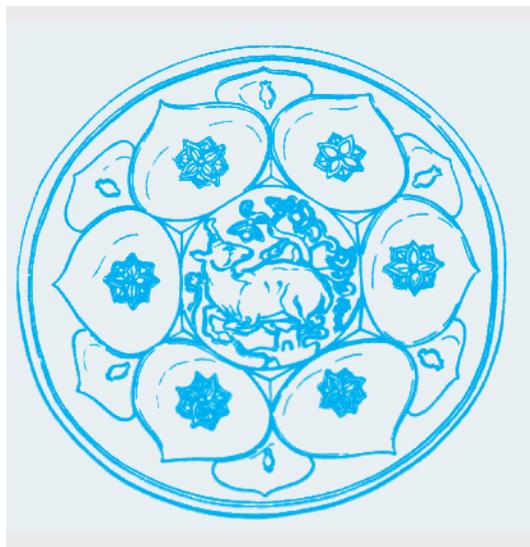


圖 29 7 世紀粟特銀器紋樣線圖 取自 Boris Ilich Marshak 著，李梅田等譯，《粟特銀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95 附圖 10 (NSP1)。

紋飾也頻見於洪州窯瓷鉢（圖 28），後者鉢內壁的八出印花朵紋也和馬爾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所列舉的七世紀粟特銀碗內壁桃形開光內的飾紋有類似之處（圖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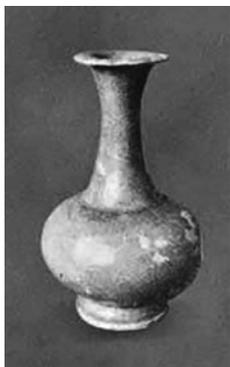
唐代江西地區居住不少波斯人。如《太平廣記》引南唐徐鉉（916-991）《稽神錄》提到鄱陽湖南的臨川岑氏在山林水中發現兩塊白石，後至豫章（洪州）以三萬錢賣給波斯胡商，遂致殷贍（卷四百四）；洪州胡商不僅高價求售象牙，甚至還擁有價值連城據說可使人水火不侵的紫靺鞨寶珠。¹⁵ 就考古資料而言，鄱陽湖西江西省城所在的洪州早在六世紀南朝已可見到來自西方的工藝品，筆者也曾指出江西清江宋元嘉二十七年（450）等南朝墓所見器形與佛教水瓶相近的今日看來應屬洪州窯的青瓷長頸圓腹瓶或和外來的器

式有關，而福建省政和縣松源南朝墓（M833、M834）出土的同式青瓷長頸瓶（圖 30），也可能是來自江西省瓷窯所燒製。¹⁶ 隋唐時期類此之西方影響案例更趨頻仍，而洪州窯青瓷的造型和裝飾或即此一氛圍的具體反映。從目前的資料看來，波斯漏花陶約出現於十一世紀，而洪州窯漏花瓷的相對年代則在隋至初唐時期，但若考慮到窯址所出漏花青瓷盤（同圖 17、19）的裝飾布局，或重圈紋杯（同圖 24）的紋飾或造型特徵，則似乎不能排除隋唐時期洪州窯漏花瓷是在西方金屬、玻璃器的啓發之下，所完成之追求薄亮響銅或通透玻璃的技藝。

漏花瓷的復興

在漏花陶瓷工藝史上，有許多至今難予解明的課題。除了前述洪州窯漏花青瓷的出現契機之外，還包括中國和波斯陶瓷漏花技藝在各自發展史上出現的斷絕，以及之後戲劇性地再度登上歷史舞臺等議題。長久以來，西方陶瓷史著作一致認為中國的漏花瓷藝是在西亞影響之下於十八世紀燒成的新品類。然而，設若洪州窯瓷鏤空處青釉乃是陶工有意識地填入糊平的推測無誤，那麼將可為中國漏花瓷藝的出現年代提供重要的考古依據。

波斯陶瓷漏花工藝可能出現於十一世紀，其出現的契機至今仍不明朗，但頻見於十二至十三世紀，迄十四世紀趨衰頹，十七世紀復甦。至於中國區域的陶瓷漏花技藝的流傳也頗隱晦，以往雖曾在景德鎮落馬橋元代灰坑發現一件青白釉漏花標本（圖 31），但僅為孤例。前數年，景德鎮陶瓷學院等另提示景德鎮湖田、三寶蓬窯北宋青白瓷鏤空器足殘器等標本，其鏤空部位明顯單釉（圖 32）。報告者認為此或為景德鎮漏花瓷的萌芽例，可能是陶工觀察到



左圖 30 青瓷長頸瓶 福建省政和縣松源南朝墓（M833）出土 取自福建省博物館等（吳玉賢），〈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文物》，1986 年 5 期，圖版參之 3。

右圖 31 青白瓷漏花瓷片 景德鎮落馬橋元代灰坑出土 取自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圖 106、107。



圖 32 宋代青白瓷鏤孔器足殘件 江西省景德鎮窯址採集 取自葉正隆、曹建文、曹春娥、張茂林、黃康明、汪健，〈景德鎮玲瓏瓷的起源探析〉，收入劉岩主編，《'15 古陶瓷科學技術 9 國際討論會論文集》，頁 35，圖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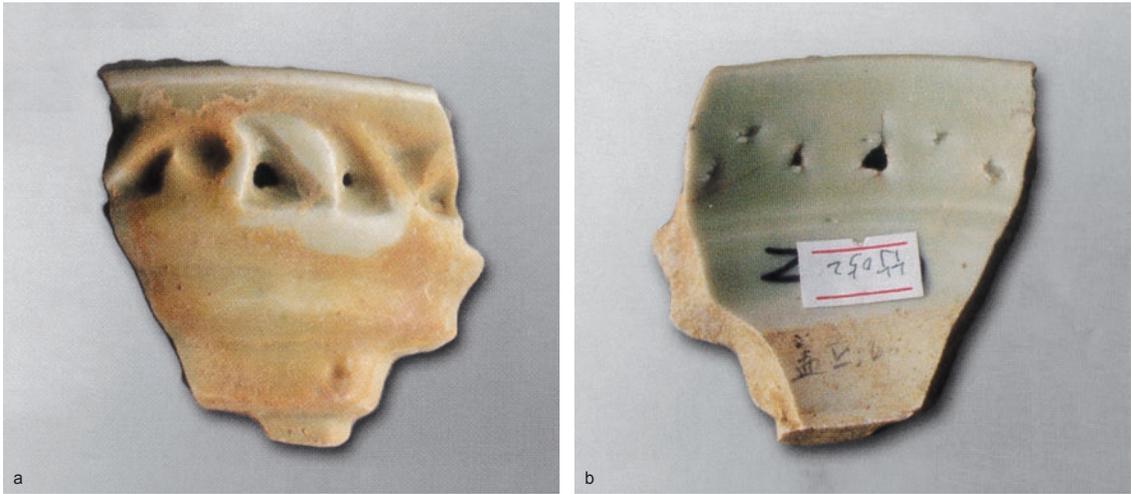


圖 33 南宋 a. 青釉鏤孔盆 b. 內側 殘寬 6，殘高 7 公分 福建漳浦竹樹山窯採集 取自王文徑，《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漳浦窯》，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 91。

青白瓷鏤空製品因自然流釉填入鏤孔，所嘗試製作的漏花瓷之雛形。¹⁷ 由於相關案例仍少，目前只能期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實證，惟應指出的是，該器足鏤空四花球紋和前引落馬橋元代灰坑標本一致（同圖 31）。另外，福建省漳浦窯竹樹山窯址曾採集到一件花盆口沿殘片，近口沿鏤空處有的內填青釉，雖然詳情不明，在此仍圖示供讀者參考（圖 33）。

除了上引個別標本之外，目前仍難確認宋元時期景德鎮瓷窯燒製有漏花陶瓷，但可確定的是景德鎮宋代薄胎細白瓷是輸往包括中東地區在內的著名外貿商品，其往往也成為消費地陶工所欲模倣的對象。事實上，以往學者雖未舉例具體論證但業已察覺波斯漏花陶瓷部分器形頗有宋瓷風韻，¹⁸ 本文在此一提示的認知之上，想進一步指出做為外銷瓷主力商品的宋代景德鎮青白瓷或沿海地區瓷窯青瓷碗，經常在內壁陰刻纏枝花卉，並以窰點填充留白部位（圖 34、35），特別是景德鎮薄胎劃花窰點飾碗，其窰點有時深入胎骨，迎光視之有如暗花，

其通透的視覺效果和波斯漏花陶瓷有異曲同工之趣（同圖 14），也因此不排除波斯漏花陶瓷的出現契機，就是為了倣效景德鎮薄胎劃花窰點的裝飾效果。反之，仍待實證的景德鎮漏花瓷乃是受到波斯同類製品的影響亦未可知，依據可攜式 X 線分析裝置 XPDF 之元素和結晶分析結果，表明宋代景德鎮曾燒製鐵離子發色之與伊斯蘭陶器以銅或銀發色的虹彩（luster）外觀維妙維肖的類虹彩白瓷，並以此外銷至埃及等地。¹⁹ 此一測試結果足資我們省思，兩地陶瓷外觀的相近裝飾效果及其可能存在的借鑑或交流等課題。

波斯漏花陶瓷的復興，無疑要以被稱為貢布隆貨或貢布隆陶瓷（Gombroon ware）製品最廣為人知。十七世紀中國外銷瓷因明清鼎革之際所帶來的動亂深受打擊，取而代之的除了日本的伊萬里瓷之外，自波斯灣港都貢布隆（今 Bender Abbas）集中輸往歐洲的波斯陶瓷，也受到歐洲消費者的歡迎，其中就包括了白釉漏花製品（同圖 16）。後者窯場具體地點不明，一

說是伊斯法罕 (Isfahan) 東部的奈伊 (Nāyīn)。

如前所述，從清宮傳世漏花白瓷的乾隆年款 (同圖 8、9)，可知景德鎮官窯至遲在乾隆朝，已經完全掌握陶瓷漏花技藝，並在乾隆五十四 (1789) 和五十九 (1794) 年命景德鎮燒造進呈。過去西方學者雖無緣點檢當時尚未公開的造辦處檔案記事，但也指出中國陶瓷漏花也就是俗謂的米粒瓷，乃是受到貢布隆白釉漏花製品的影響

而初現於十八世紀的乾隆朝或稍早的雍正朝，不過此僅止於推測，迄今未見具體的檢證。另一方面，近年公布的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標本當中也包括了在器壁鏤孔的青花漏花碗，碗底書青花「康熙年製」款識 (圖 36)。該青花標本出土於遺址探坑的第一層表土層 (AS2010T201 ①:1)，從碗式以及內壁青花裝飾布局等均和日本長崎市築町遺跡寬文火災層 (1663) 出土的同樣在器



圖 34 北宋 a. 青白釉菊紋碗 b. 線繪圖 大觀三年 (1109) 墓出土 高 7.8 公分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取自彭適凡編，《宋元紀年青白瓷》，香港：莊萬里文化基金會，1998，頁 52，圖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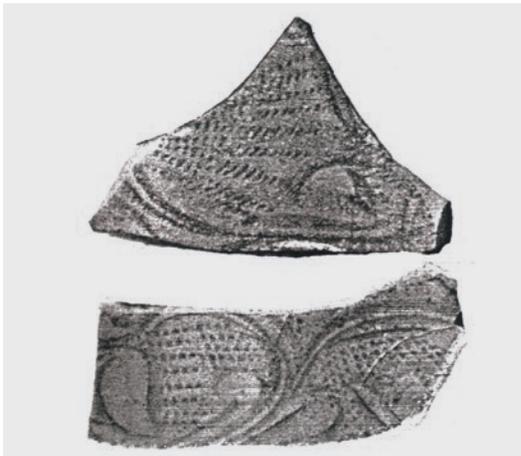


圖 35 Fostat 出土南宋時期篋劃花紋青瓷殘片 取自 Gyllensvärd, Bo.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ostat. I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7 (1975): pls. 3-3, 3-6.



圖 36 17 世紀「康熙年製」青瓷漏花碗 口徑 11.8，高 5.6 公分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朱巖石等)，〈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9 年 4 期，圖版貳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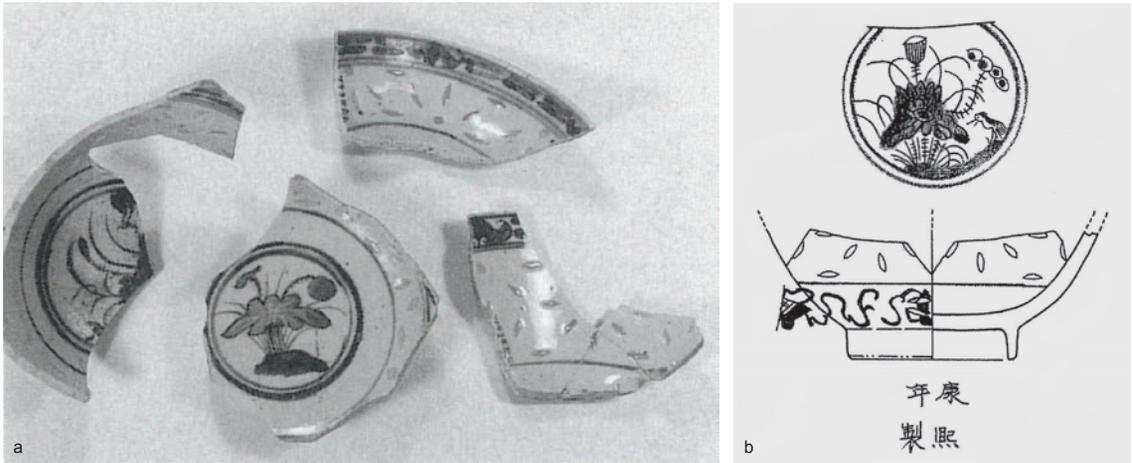


圖 37 17 世紀 a.「康熙年製」青瓷漏花碗 b.線繪圖 日本長崎築町遺跡出土 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発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7，PL. 25 之 25；頁 31，圖 19 之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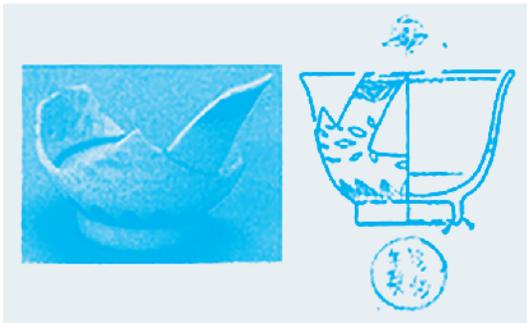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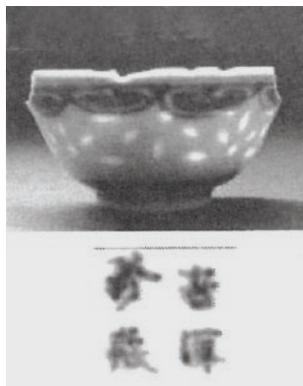
圖 38 19 世紀 「成化年製」款青花漏花碗 東京大學本郷出土 (TUD-0531) 取自近世貿易陶磁器調査・研究グループ，《近世都市江戸の貿易陶磁器資料集 (1)》，近世貿易陶磁器調査・研究グループ，2013，頁 466，圖 447。

外底書「康熙年製」的漏花碗相近（圖 37），可以認為其相對年代很可能就是在十七世紀中後期的康熙（1662-1722）初期。此一年代觀極為重要，因為其不僅可以修正長久以來西方陶瓷史著作認為，中國米粒瓷的年代只能上溯十八世紀的說法，甚至可以重新評估康熙期青花漏花瓷和所謂貢布隆陶瓷的影響關係。

另一方面，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遺跡亦頻見由景德鎮輸入的青花漏花碗，其碗底有



左圖 39 「大清嘉慶年製」款青花漏花碗 東京四谷三丁目御家人屋敷遺跡出土 取自弦本美菜子，〈鎖國期日本への中国陶磁の流通〉，《東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紀要》，2014 年 28 號，頁 138，圖 4 之 31。



右圖 40 19 世紀 「若深珍藏」銘青花漏花碗 日本長崎唐人屋敷遺跡出土 取自近世陶磁研究會，《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年代の判る罹災資料—中国陶磁と肥前陶磁の相伴資料を中心に—》，佐賀：近世陶磁研究會，2020，頁 60，圖 10 之 34。



圖 41 17 世紀前半 青花鏤空爐 高 7.7，口徑 5.9 公分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藏 取自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Ⅵ—江戸の技術と裝飾技法—》，佐賀：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8，圖 97 之參考圖 15。

青花「成化年製」（龍岡町遺跡）（圖 38）、「大清嘉慶年製」（四谷三丁目遺跡）（圖 39）、「若深珍藏」（唐人屋敷跡）（圖 40）等多種款識，標本多屬十九世紀廢棄遺留，除了嘉慶年製為當代款識之外，餘均屬十九世紀製品的偽款。或可附帶一提，日本肥前瓷窯雖在十七世紀中期已經燒造在樣式上與漏花瓷相近的青花鏤空球

紋玲瓏瓷（圖 41），但陶瓷漏花製品似只能上溯明治十九年（1886）樋口治實的含珠燒，後者曾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製作漏花菊桐紋杯獻呈皇室。²⁰從今日的考古出土資料看來，含珠燒的漏花技法，很有可能是受到中國輸日的漏花陶瓷的啓發才得以實現的陶藝。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註釋：

1. ダントルコール著，小林太市郎譯注，《中国陶瓷見聞録》，東洋文庫 363（東京：平凡社，1979），頁 170-171。另外，一說認為該記述指的就是鏤空處以釉糊平的米粒瓷，此說見：林梅村，〈從玲瓏瓷看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文化交流〉，收入同氏《波斯考古與藝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頁 248，本文對此不予採信。
2. Christia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imited, 1997), 82.
3. 鐵源等，《清代官窯瓷器史》4（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2），頁 1150。
4. 余佩瑾，〈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頁 391，no. 52。
5. R. L. Hobson, "Notes on an Early 'Persian' Bowl and 'Rice-Grain'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1, no. 50 (1907): 83-89.
6. Sir Harry Garner,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4), 52.
7. Eleanor Hartstone, *Rice Grain Porcelain* (Eleanor Hartstone, 1978), 23. 不過，同氏所揭載的所謂雍正朝漏花白瓷，當中的一件觀音瓶（Fig. 1）的造型和裝飾均和相對年代或在乾隆時期的臺北故宮藏無款白瓷瓶（同圖 7）一致，有較大可能同屬乾隆朝製品。至於另一件同氏所揭示的雍正朝白瓷漏花龍紋盤（Fig. 3），底有乾隆年間「敬畏堂製」青花款，故其年代也應在乾隆時期。
8. Oliver Watson, *Ceramics of Ir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70-171.
9. 陳柏泉，〈洪州窯駁議〉，《江西歷史文物》，1981 年 1 期，頁 21。
10. 余家棟，〈試析洪州窯〉，收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93；江西省博物館等（程立憲等），〈江西豐城羅湖窯址發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1981 年 1 期，頁 43-52。
11. He Li, *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6), 314.
12. 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等，《豐城洪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13. 余家棟，〈試析洪州窯〉，收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頁 98。
14. 張琨林，〈南北朝陶瓷與金屬工藝：以響銅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頁 56。
15. 石田幹之助，〈西域の商胡、重價を以て宝物を求めると一唐代支那に広布せる一種の説話に就いて一〉，收入同氏，《長安の春》（東京：平凡社，1967），頁 216、242。
16. 謝明良，〈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綜合探討〉，原載《故宮學術季刊》，7 卷 3 期（1990）；〈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原載《故宮學術季刊》，6 卷 3 期（1989），兩文均收入《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168-169 及頁 128。
17. 葉正隆等，〈景德鎮玲瓏瓷的起源探析〉，收入劉岩主編，《15 古陶瓷科學技術 9 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2015），頁 33-34。
18. 吉田光邦，《ペルシアのやきもの》（京都：淡交社，1966），頁 179-180；杉村棟，〈東方イスラーム世界の陶器—シリア・イラク・イラン・アフガニスタン・中央アジア—〉，收入《世界陶磁全集》（東京：小學館，1986），頁 142。
19. 村上夏希等，〈フスタート遺跡採集白磁のラスター彩風裝飾に関する材質調査〉，《貿易陶磁研究》，38 號（2018），頁 57-61。
20. 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佐賀：肥前陶磁史考刊行會，1936），頁 177-178。